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十四

一群艺术家与一个艺术村落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核心提示

今年6月14日至15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村连续展示了22场行为艺术,这是全省目前规模最大的行为艺术展示活动。

两年前,石佛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村民,一批艺术家聚集该村,河南唯一的一个艺术家村落——“石佛艺术公社”诞生了。

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为艺术家们创造了宽松的成长空间,艺术之花生逢其时。仅仅两年间,石佛就吸引了1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入住,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郊区农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嬗变,成为像北京798艺术区、深圳大芬村一样的艺术聚集区,并有望打造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

一个艺术家聚集的村落

石佛是一个被铁路与市区分开的小村落,曾经是那样的默默无闻,一群艺术家的到来,打破了该村的沉寂。

10年前,出生于石佛村的油画家黄国瑞被中国油画学会派往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在游历了多个国家之后,黄国瑞最终在美国纽约落脚,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成功。随后,黄国瑞决定在国内设立自己的工作室。

最初,黄国瑞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时隔不久,他发现大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喧闹纷扰的氛围并不利于自己从事艺术创作,回到河南老家的省亲之行,使他看中了石佛闹中取静的环境。2006年4月,黄国瑞在石佛中街179号院自家楼顶上加盖了艺术工作室。

在黄国瑞看来,地处城乡接合部的石佛远离都市的喧嚣,房租便宜,艺术家生活在此,心灵得以沉静下来,有利于潜心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此后,黄国瑞习惯了在纽约、石佛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在石佛待的时间比在纽约的时间还要多一些。这种两地飞来飞去的状态,让他始终有一种新鲜感。

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日趋火热,各处不乏有文化艺术家聚集的艺术村出现,如北京的宋庄、索家村国际艺术营、798艺术区,上海的苏州河畔等等,但这些艺术村都是仅有一个隔离的环境,没有与现实生活发生互动。

生活在石佛,随处可见农民的生活场景,艺术家能够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里去,触摸到更多的社会发展变化痕迹,这里的原生态能够



这样的艺术活动经常出现在石佛村民家门口

激发起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黄国瑞告诉记者:“石佛是个纯粹的中国乡土农村,东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影响着我的创作观念和思维方式,我的艺术爆发力也变得更强。只有这么接近生活,才能真正让你思考当下的生活与艺术。”

继第一个“安家落户”的艺术家黄国瑞之后,很多艺术家都相中了石佛村,相继来到这里建立艺术工作室。

来自山西长治的青年画家裴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老家发展,而是来到石佛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个艺术家扎堆的地方充满了机遇,半年多时间,裴凯的作品就参加了两次画展,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在过去我想都不敢想,因为按画家发展的老路子,有的人画了半辈子也不一定参加画展。”

石佛是一片自由的艺术天地,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家经常在交流中撞击灵感。禹州的张军伟原本是美术教师,现在也慕名来到石佛村建立了工作室,“这里有自由交流的空间,既给我提供了外面的信息,又提供了很多外界了解我的机会,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想象的。”

2006年5月30日下午,在石佛村黄国瑞的艺术工作室里,50多名省内外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河南省美术馆馆长化建国宣布:“石佛艺术公社”诞生了。

“石佛艺术公社”并非是个组织,而是指石佛成了艺术家的聚集地。相对于北京、上海等



中外艺术家在石佛村现场交流

地的艺术村而言,石佛的生活成本低,很多艺术家与村民签订合同,投资在村民的住宅楼顶层加盖艺术工作室,免费使用10年,10年后工作室归村民所有,如果艺术家仍需要这个工作室就转为低价租借。不盖工作室的艺术家也可以直接租房。

仅两年时间,石佛就迅速聚集了人气,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想象。目前,石佛村已成为130多名艺术家的聚集地,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村”。

一群追逐梦想的艺术

走进石佛村,你很容易就能与艺术家邂逅,而每一位来到石佛的艺术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追逐梦想的故事。

在这些追梦者之中,有一位带着儿子的画家尤为引人注目,当初,这对父子都是带着梦想来到郑州的。

47岁的画家廖虹在入住石佛之前,在上海一家投资公司任职,做着与自己的艺术追求无关的工作,一年下来可以拿到近20万元高薪。两年前的某一天,廖虹正在上初三的儿子廖野突然提出,他想退学回家,重写《三国演义》!在很多人看来,廖野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廖虹却很理解儿子——青春年少时,他像儿子一样喜欢“异想天开”,从大学油画系毕业后,他曾经在艺术王国中沉醉了一段时间,后来却无奈地放弃了梦想。

儿子的大胆想法,使藏在廖虹心灵深处的追梦激情喷发而出,他决心再次为梦想搏一把。他对儿子说:“生活就像一条河流,许多人愿意做一只漂流瓶,在河里随波逐流,他们活得不用太费劲。你选择了一种新生活,就意味着开凿了另一条河,需要自己寻找水源,你要准备着自己的爱好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廖虹辞去了工作,廖野也退了学,父子俩来到郑州。廖虹入住石佛村,一个人执著地画画。廖野住在市区租的房子里,摇着仿造的诸葛亮的鹅毛扇重新创作《三国演义》。

在艺术家们眼里,石佛的艺术圈子里没有门派之见,艺术氛围宽松而自由,是一块成就梦想的理想之地。这里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前来放飞梦想。

一个被艺术家改变的村庄

众多艺术家的到来,不仅抬高了石佛的房租,使当地农民有了致富新路子,村民的精神层面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憧憬着艺术家的到来给石佛带来的美好前景,村民白国臣产生了许多创业计划:开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饭店,成立一个专门为画家生产画框的工厂,每天为艺术家们提供打扫卫生等服务。“这些艺术家带动了整个村子”,白国臣说,很多村民都产生了围绕艺术产业做文章的想法,有人还准备开办画廊。

村民们与艺术家朝夕相伴,在潜移默化中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村民用水泥硬化院子,艺术家却用他们抛弃的砖头和石子;村民为客厅的花瓶插满塑料花,艺术家却在找他们要高梁装饰瓶子;村民为房子贴瓷砖、做吊顶,艺术家的工作室却是水泥石泥墙、水泥地面;村里1958年建的电影院已是又脏又破,艺术家却看

中了那块地方,要把它建成艺术展厅……

现在,石佛在国内外艺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石佛的艺术气息越来越浓,艺术家和当地村民和谐相处,形成了时下很少见的艺术家扎根于农民之中的创作状态。

今年5月7日,“石佛艺术公社”两周年展览——“和谐石佛国际艺术大会”在石佛村举行,约150名国内外艺术家带来300余件作品参展,其中不乏美国、德国等地顶尖艺术家的作品。现代与传统在石佛集合,街头挂着或西或中的绘画,路上摆着亦庄亦谐的雕塑,艺术家装扮成“唐人”坐在砖头垛上下棋……

一个打造“中国佛罗伦萨”的愿景

记者在黄国瑞的工作室看到,一个大得像会议室的房间里摆满了油画作品,红色的“人”字形屋顶十分引人注目。“国际艺术之都佛罗伦萨”的街区都是一片红色的房顶,给人很强的艺术感,我们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风格。”黄国瑞告诉记者。

石佛的很多艺术工作室都是红色的“人”字形屋顶,艺术家们此举意在表达一个愿景——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当代性、国际性”,“创造自己的风格,玩自己的玩法”,将石佛打造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

在黄国瑞的设想中,石佛还要吸引音乐家、文学家、导演入住,还要有书店、艺术品商店,他说:“只有各种艺术家加入,才有利于艺术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切磋,这里才真正称得上是艺术村。”

2006年10月23日,意大利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领域的权威、著名艺术评论家莫妮卡来到石佛村,她的到访被视为石佛在国际交流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2007年9月,美国的画廊人士来到石佛考察。今年1月11日,“石佛艺术公社”的作品在纽约SOHO艺术区456画廊展出,作品涉及油画、摄影、雕塑、装置艺术等,“石佛艺术公社”集体在国际上亮相,为期15天的展览颇受好评,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去参观。黄国瑞透露,石佛的艺术作品今后将走向国外每一个重要艺术城市,范围侧重于纯学术、更尖端的作品。

河南省文联主席马国强认为,“石佛艺术公社”是在河南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是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必然结果。“我们有意把‘石佛艺术公社’纳入省美协专业委员会中,使现代艺术家融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之中,为发展中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为艺术产业化开辟一条路子。”

新闻时评

政治进步需要更多的民意参与

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市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抽样调查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把选人用人、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重要工作放在干部群众面前,接受干部群众的评价。

开展干部任用民意调查,在一般人感觉“神秘”的选官治吏程序中引入更多的民意评判,显示了干部工作公开透明的方向。民意评判从衣食住行等民生领域向政治生活领域拓展,也预示着有序政治参与扩大的趋势。

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民众对扩大政治参与的期望和渴望。干部任用几乎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关注。现实中任何一个腐败官员的落马,也无一例外的伴随着民意的汹涌翻腾。基于这样的现实要求,以民意为主题,以调查为手段,扩大民众在官员前途与命运上的话语权,能够促使政府与官员行为更为主动地向民众的意见靠拢,对民意保持敬畏之心,从而避免权力运行偏离其应有的轨道。

民意调查这一形式虽然起始于西方,但对中国社会而言,它的作用的发挥,应不仅仅局限于商业的需要和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层面。政治实践中熟练地运用它来进行权力与民意的对话,以及得到干部任用和权力运行的意见反馈,这不仅是减少施政成本的有效途径,更是提高其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虽然民意调查并不总是表现为对官员强烈的、清晰的、统一的认同,但民众的集体理性最终会占据主流,从而形成相对客观和公正的决策参考意见。

干部选拔任用,过去我们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便有尊重和尊重民意的意思。但缺少科学的量化的测量,民意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便比较模糊,很容易被虚置。引入科学民意调查方法,并使之制度化,让民意更加直观具体,才有可能将民意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这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样本量达8万之巨,抽样范围遍及从乡村基层到中央各层级的干部和群众,每年一次持续进行。并且中组部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这样的设计和规定,已经清晰表明中央对此次民意调查科学性和公正性的重视。

民意调查的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独立性和真实性。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就必须在机制上不断完善考虑,充分考虑民众的参与意愿和接受度、调查机构的确定、样本的选取、过程和结果的公开等每一个程序和细节,避免任何形式主义,避免任何信息的垄断,避免任何力量操纵,避免任何利益关联。只有这样,民意才能在政治行政领域里有更充分的表达,民意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稳稳当当地落到实处。

李琼

错时上下班能否全国推广

1986年,中国曾为了节电在全国范围推行夏令时,但6年后却不得不取消。这并非夏令时的构想不合理,而是一些方面考虑不够周全,某些配套措施跟不上,如交通时刻表调整能力差导致时间转换时频发混乱,全国实行统一时间未顾及5个时区的差异和南北的巨大温差,以及当时生活水平低下、家庭普遍没有空调,在炎炎夏日无法按设计者的初衷“早睡早起”等等。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构想和政策,能否得到贯彻和推广,所考虑的并非仅仅是该构想本身,而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性考量。

7月13日,北京市宣布自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实行“错时上下班”,不同单位的上下班时间不再安排在统一时间段,而是刻意错开,避免“撞车”。显然,这种安排是为了解决奥运期间北京市早晚上下班高峰

期的交通压力,确保城市道路的通畅,减少交通拥堵,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尝试。

由于城市人口的上升、车辆总数的不断膨胀,给中国许多大城市的交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错时上下班”的措施虽是针对奥运的临时性安排,但堵车成患的现象,显然绝非北京独有,更绝非奥运期间才有,如能在平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推广,将是一件几全其美、大家方便的好事。就拿上海来说,无论是人口、车辆密度,还是当前城市交通面临的压力,都与北京有相似之处,且世博会举办在即,届时,北京所遇到的困难,上海恐怕一样也不少,而如能推广“错时上下班”,也许能有效缓解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问题是构想虽好,若考虑不周详、配套措施跟不上,结果就很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事与愿违。比如,“错

时上下班”固然可以缓解交通压力,但不同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工作时间被人为错开,势必造成一些工作衔接上的混乱和不便;再比如,“错时上下班”固然让早晚高峰的人车流量峰值大大降低,但由于各行业、各单位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安排在不同时段,早晚高峰的时段却相应地有所拉长,如果规划不周、考虑不密,很可能旧病方除,新病又出,达不到原先设想的良好效果。

在中国曾经半途而废的夏时制,却在世界很多国家实施效果良好,关键自然在于这些国家在实施过程中考虑周详,配套措施得力。中国能否把奥运期间北京即将实施的“错时上下班”推广到平时、推广到更多饱受交通拥堵之苦的城市,能否在推广过程中避免重蹈当年夏时制的覆辙,关键同样在于此。

陶短房

畸形的培训



新员工入职培训课上,8个大学毕业生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放下面子,便排成一排,在台上互钻胯下——近日,乐山某医药公司的一名新员工在网上发帖讲述了自己在该公司培训课上的所见所闻。该公司这种培训员工的方式立即引起网友们的讨论,多数网友认为涉嫌侮辱人格。对此,该公司董事长称自己是在用亲身经历教育员工,“受得屈中屈,方为人上人”。(7月14日《成都商报》)

有些公司培训员工越来越不像话,不是从正统的道德、伦理、人格、尊严上去培训员工的基本素质,而是从侵犯人格、尊严上去“虐待培训”,表面上看是为了“培训容忍”,实际上是把职工培训成“奴隶”,旨在更好地“欺压员工”。只可惜时代不同了,在

法制不断健全、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的今天,谁要进行“奴隶主的专制”,谁就要成为法律的牺牲品。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虐待、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让员工互钻胯下,明摆着是拿员工的人格尊严不当干粮,员工“服从”了,并不是不知道依法保护自己,而是就业艰难选择了“忍辱负重”罢了。

公司的生机活力来自于公司的人性化管理,只有为员工着想,才有员工为公司着想,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公司领导与员工离心离德,根本就发挥不出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而滋生出懈怠、厌倦和怨怒来。由此看来让员工“钻胯培训”,实际上就是挖公司的墙角。

切记,没有员工的尊严,就没有公司的尊严和灿烂的未来。

文 郑家侠 图 张兮兮

有话有处说是社会的安全阀

在反省瓮安群体性事件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多方为群众提供畅通的诉求渠道,使群众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难有处帮,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7月10日《中新社》)

瓮安事件发生以来,作为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不回避“深层次原因”,又是向受害群众鞠躬道歉,又是厉言批评“不要向专政手段对待群众”,这些诚恳地站在民众一边、不讳言官体制痼疾、不袒护法权官员的善治姿态赢得了舆论的尊重,也使瓮安事件的解决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瓮安事件之所以酿成,正源于资源开发、拆迁等一些日常冲突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理没处讲、有苦说不出,矛盾越结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一切陷入不可治理、不可解决的失控状态,在一触即发一点就着中演化成一场群体性暴力冲突。因此,建立“有理有处讲,有话有处说”的利益诉求渠道,就是让矛盾、小情绪、小冲突有暴露和缓解的出口,使矛盾止于可治理状态,避免矛盾在郁结中失控。

“可治理状态”是一种可以控制、可以把握、可以预期,可以在法律框架中通过非暴力的博弈、沟通等手段解决的状态,相反是不可治理状态:战争、流血冲突、群体暴乱、红着眼睛杀人,等等。只要矛盾仍在可治理状态,一切都好办,再多的冲突都不用于担心。如何使矛盾可治理呢,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使矛盾当事人保持冷静和理性,让他预期到问题可在法律框架中得到解决,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尊重法治、一个讲理的社会。而要让他相信这个社会讲理,首先就让他觉得有地方讲理,让他讲理的声音能发出来。否则,如何让他相信这是讲理的社会、自己会得到公正的待遇?无处讲理就很容易变得不讲理,丧失理智,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能做出来。

让公众有话有处说,换成更普世的表述,就是尊重公众天赋不可让渡的表达权利,这种权利是社会秩序的“安全阀”,正如传播学专家所言,任何社会都难免因为各种原因而形成不满情绪,对不满情绪一味压制,只能酿成激愤和暴力。而畅通的表达不仅能保证公众的不满情绪及时被发现,还能为不满情绪提供及时宣泄的场所。

石宗源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我想,这主要是要求官方要为公众提供“有理有处讲”的表达渠道,比如信访、举报、申诉等官方主导的途径。其次,也要有民间自主的表达系统,也就是立法使公众能够自由言说,有不满随时随处可以自主地说出来,而不是“官方让我讲我听我讲我才讲”。只有公众自己掌握了“有理有处讲”的权利,掌握了“有话有处说”的平台,才会真正形成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曹林